

先予后得：深度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方位

虞崇胜

摘要：已经持续近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全球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时空之中。分析疫情治理中的国家关系，发现一个没有被人们充分注意的全球化发展悖论：全球化发展已经将世界各国联结成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但现实中各国似乎都回到了前全球化时代各顾各的自然社会状态。有些大国采取不合作的消极防疫政策，固然有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但认知上的错误则是没有看到初期全球化与深度全球化的区别。深度全球化将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国发展与本国发展已经成为共同的问题，不同国家已经形成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于是，先予后得就成为深度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大国关系也将三个方位演进：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将他国发展作为本国发展的前提。

关键词：深度全球化；大国关系；先予后得；国家方位；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2) 04-0011-06

“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方位”所指的“大国”并非国土大的国家，也不是人口多的国家，也不是国力强大的国家，只是从推进全球治理的角度，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互助。研究大国关系，并不是要建立以大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是为了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不是大国的游戏场和角斗场，而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栖息地和交往地。因此，

我们讨论大国关系，其实是讨论不同国家如何为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深度全球化时代，由于世界已经日益形成利益相关的共同体，因此，与前全球化时代的明显区别就是，大国不能再以压制或限制他国发展作为本国发展的条件，相反，本国的发展必须以他国发展为前提，他国如果得不到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得不到发展，本国也就难以得到长久的良性发展。于是，先予后得就成为深度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一、先予后得是深度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可以有各种各样和千变万化的存在方式，但是说到底都是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表现在国家间的关系上，其实就是予得关系，也就是给予和得到的关系。

关于国家间的予得关系，人们比较熟知的是多予多得原则，就是给予得多才能得到得多。根据经验与常识，予得关系最好的状态是予与得平衡，只有予得平衡，世界才能平衡，才能形成公平世界和和谐世界。但是，即使是予与得平衡，仍然存在一个予得先后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予得先后也有先予先得、先予后得和后予后得、后予先得四种情况。

在予得先后的四种情况中，先予先得、后与后得与后予先得都与全球化时代“命运与共”不合，因此，只有先予后得才是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时代，大国如果做不到先予后得，国家关系就会混乱，世界就不得安宁。大国只有遵循先予后得原则，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才能进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想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先予后得虽然是人类关系中的基础性原则，但其具体属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是不一样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先予后得只是一种道德要求，先人后己曾经被历代政治家和民间社会作为美德所倡导，但并不是法定规则，不具有强制性。而在全球化时代的国与国关系中，先予后得就不只是一种美德了，而是建立国家间关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或基本规范，因为全球化将各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各国的发展（无论是经济或是文化发展）都依赖于他国，他国不存在或他国不发展，本国也就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于是他国发展就成了本国发展的前提，他国发展与本国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共同的问题，即不同国家已经形成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因为如此，先予后得就成为深度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二、全球化带来各国高度发展的生产力

深度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必须遵循先予后得

的原则，这不是人为倡导的问题，而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简单来说，是因为全球化时代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全球化本身带来的，各国高度发展的生产力都得益于全球化。

所谓全球化有不同的解释，但最初都指世界各国的普遍性联系。在前全球化时代，各国基本上是独自发展的，其生产力受到自然和地域的影响，一般都比较落后。进入初级全球化时代后，随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发展，打通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世界逐步联结在一起，从而带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

关于世界性联系和资产阶级崛起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2]

资产阶级不仅开拓了市场和建立了世界性联系，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庞大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

资产阶级创造的庞大生产力，说到底是世界性联系即全球化联系带来的。但是，资产阶级因其阶级局限性，却没有建立相应的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分配体系和制度体系，“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4]

而这种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却不能

解决世界性或全球性联系与资产阶级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自由竞争的结果就不能跳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窠臼。于是，利用世界性联系（全球化）发展壮大起来的大国为了争夺世界性资源和财富，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生死决斗。这正是20世纪上半期人类蒙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原因。

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人们开始思索如何跳出之前通过竞争和战争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途径，于是就有了联合国的诞生，人们希图借助联合国协调解决人类的共同性发展问题。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为谋求世界和平安全发展和为解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但是，联合国由于受到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限制，以及自身体制的局限，其实际作用十分有限，难以应对全球化时代资本竞争、大国博弈的复杂局面。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发现了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局限：“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于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5]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中，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针对其生产关系的弊端进行过不少的调整，诸如在国内建立社会底层保障制度、增强国家干预功能、扩大社会共享产品范围等等，在国际上加强经贸往来、对落后国家提供某些物资援助等等，但所有这些调整并没有触动资本集聚和社会分化的根本矛盾，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

解决世界市场形成之后的予得关系问题，反而由于资本竞争所导致的政治极化愈演愈烈。这种政治极化现象在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又一次得到充分验证。

三、造成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因素之一：大国关系错位

已经持续近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全球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的时空之中。仔细分析疫情治理中的国家关系，我们发现了一个并没有被人们充分注意到的导致疫情蔓延的全球发展悖论：全球化发展已经将世界各国联结成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在现实中各国似乎都回到了前全球化时代各顾各的自然社会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其来和在全球蔓延，其冲击力和影响力不啻一场世界大战，既有国际关系遭受重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黑天鹅”与“灰犀牛”接踵而至，世界局势呈现历史上罕见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蔓延，固然有新冠病毒的不确定性，人类对它认知有一个过程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各国对于疫情的重视程度和采取了不同的防治政策，从国家关系角度讲，疫情广泛蔓延是由于大国关系错位造成的。疫情发生后，一些大国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为遏制疫情蔓延作出贡献，而是纠结于查找病毒源头。结果是，本国疫情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和防治政策失当，从而迅速蔓延开来。而全球疫情由于各国的不合作，各自为政，各顾各的，从而导致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不仅暴露并加剧了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且在国际层面同样暴露并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些最不发达经济体的卫生条件较差，卫生系统对疫情的准备不足，人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更容易受到传染，而且他们也不像发达经济体那样拥有充足的资源去应对疫情的经济后果。就世界范围来说，只有在全球所有地方的疫情都得到控制之后，全球疫情才能得

到根本控制；同样，只有在全球经济出现强劲复苏之后，经济低迷才能得到遏制。这就是为什么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提供所需的援助，既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也涉及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援助，全球疫情将持续更长的时间，全球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将出现严重分化，从而大国的利益同样也会遭受巨大损失。

仔细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些大国之所以采取不合作的消极防疫政策，固然有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但认知上的错误则是没有看到初期全球化与深度全球化的区别。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之前称为初级全球化，之后称为深度全球化。深度全球化出现了两个后果：国家间依赖更加紧密，国家间竞争更加激烈。具体到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这两个后果表现为：一方面疫情蔓延需要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应对，而一些国家却是各顾各的，相互甩锅，甚至无端向其他国家索赔。

众所周知，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引擎，一度成为许多国家的模仿对象，但那只是初级全球化的情况，同时也显示出美国体制的局限，因为一强独秀、遏制他国发展既不符合深度全球化的要求，也容易形成自大心理，助长霸权思维，看不到他国发展的既成事实和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趋势。全球化越深入，这种局限越明显。近年来，美国原有的在初级全球化时代显得有些优势的体制，由于未能适应深度全球化要求而得到及时调整。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出的，美国需要换一种“新思维方式”，要理解这个世界太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具有其他国家无法威胁的单方面优势”。^[6]但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们却错误地将美国体制的衰落归因于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从深度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来看，“一花独放不是春”，一国的强大必须以他国的强大为前提，而且，仅仅以强大与否来衡量国家发展已经不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可以认为，美国之后，世界再无霸主，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无主世界”，即深度全球化将形成一个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

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建国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利用其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理优势，与主流世界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但美国并没有完全孤立自己，它能够自主选择参与国际事务的时间和地点。1945年后，美国逐渐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和外交上取得全球领导地位——1991年苏联解体后更加坚固。冷战期间，美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世界，部分原因是它划分了民主的和独裁的两个世界。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划分有其局限性。民主国家盟友是美国的天然伙伴，集体外交仍是对抗俄罗斯等其他独裁国家的最强有力的外交方式。但在将某些非民主国家视作盟友或伙伴方面，美国始终前后矛盾（若不是一种虚伪的话）。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今天，军备控制、核不扩散、气候变化以及现在面临的疫情等议题都需要美国与所谓专制独裁政权合作，以实现美利坚式的目标。

21世纪的今天，尚未形成一个有支配性的、共同的安全威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转变降低了这种支配的可能性。当一些国家因为某个单一安全威胁而结盟，取代了其他可能的与之存在分歧的国家利益时，超级大国便更容易主导世界。例如，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浩劫结束后出现的“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或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互将对方视为存在的威胁，各国都谋求来自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庇护。

然而，如今的美国早已不再独树一帜，也并非始终高居顶端，而是身处国际社会的漩涡中，既塑造国际事务和势力，也被国际事务和势力塑造。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某一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他国——能够凌驾于他国之上的世界了。^[7]

因此，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大国不要再寻求成为全球化的主宰，这样做不仅狭隘也做不到。全球化固然需要大国推进，但说到底它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一个必然过程，可能某些大国在其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但全球化进程并非是由这些大国主宰的。对于大国来说，需要的是更高水

平的开放，特别需要的是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世界公共产品——这才是国家能力、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在全球化初期，世界各国之间的依赖并不十分紧密，各国和各民族尚能按照原来的存在方式生存下去，但深度全球化之后，怎样将国家发展与人类解放和人类发展联系起来，已然成为深度全球化时代的根本问题。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离开了他国发展本国也难以发展得好。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会重复过去“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和“强国享天下，一霸越千年”的局面，而是进入到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生死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

既然世界已经连成一体，各国已经形成为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那么，全球性生产必然要求全球性分配，甚至可以说能否做到全球性分配已然成为全球性生产的前提条件。因为任何生产已经不只是为了本国消费而生产，而更多的是为了交换而生产，那么，如果生产不能给全球所有国家和民族带来好处和利益，那么生产就失去了基本的意义。

就全球性分配而言，在初级全球化时期，一般情况下可以继续通行几千年以来形成的多予多得、少予少得、不予不得的原则。但是，在深度全球化时期，由于世界性联系更加紧密，世界各国各民族如同一个大家族中的成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予得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知道，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并不是什么竞争关系，更多的是互利互助、相互帮扶关系，是不会计较得多得少和予多予少的，通行的规则一般都是先予后得，甚至是多予少得，家庭成员的利益是通过全家的利益来体现的。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亦应如此。

四、深度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的三个基本定位

如何给深度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定位，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国际关系中往往一个错误的政策就会给全球化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本来是一次促进深度全球化

发展的极好机会。只要各国本着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精神，团结应对，联防联控，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是完全有可能将全球疫情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的。遗憾的是，有的大国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和政治需要，拒绝全球性配合，消极应对国内疫情，制造意识形态和制度壁垒，结果导致全球疫情一发而不可收拾，致使人类社会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沉重打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带来的全球危机说明，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发展，人类需要重新定位大国关系和国家间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如同世界上万事万物一样，大国地位在深度全球化时代也是变动不居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主宰人类命运。“在世界事务中，领先的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因为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突破可以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优势。”^[8]

既然国家力量总是此消彼长的，因而各国必须要有平常心态，尊重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而不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嫉妒和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其实，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后发展的大国已经不可能再走全球化前期强国必霸的老路，严格来说，新崛起的大国已经不可能是霸权国家的崛起，而只能是文明型国家崛起。就全球发展来说，只有文明型国家才能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

于是，给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定位，就成为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课题。它不仅需要严格依据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的全新逻辑和发展愿景，而且需要结合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教训，才能相对精准地预设大国关系方位。根据上述先予后得的基本原则，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大致有三个基本方位：

其一，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启示人们，大国关系亟待调整和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疫情不仅是对各国执政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大国关系的考验，还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检验。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必须走多边主义道路，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国家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分歧不能深化为对抗，应该及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必要的，但必须是积极和良性的，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不能仅仅关注本国的眼前利益而忽视甚至损害其他国家以及人类长远的共同利益。

其二，大国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大国因其大，所以对世界的贡献也应该大，应该提供更多的世界公共产品；大国因其大，所以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大国因其大，所以要带动其他国家发展，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帮助。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大国就是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在维护和平与发展上，大国肩负着特殊责任，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来寻求本国的安全，不能通过霸凌行径剥夺别国的发展权利。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将和各国一道，共同抵制所谓本国优先的歪理，共同反对零和博弈的邪道。的确，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只有大国能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承担起全球稳定器的作用，世界才能和平安宁、和谐发展。

其三，将他国发展作为本国发展的前提。这是深度全球化时代区别于初级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地方。自航路开通以来，全球化历程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如果从2000年算起深度全球化也已经20多年了，但是，时至今日人们似乎仍然没有摆正大国方位。在初级全球化时代，国家强弱的标志主要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在深度全球化时代，由于世界的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不同国家已经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各国都必须将他国发展作为本国发展的前提。能否提供更多的世界公共产品成为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志，提供的世界性公共产品越多，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越大。

综上所述，深度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方位原则就是先予后得，甚至是多予少得，为人类共同

发展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正如老子《道德经》最后一章（第八十一章）所言：“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是没有占有之心的，他帮助别人发展从而自己也更充足，他尽力给予别人从而自己更丰富。自然的规律，就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而不伤害它们。圣人的行为准则，就是好好做事而不跟别人争夺。）《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结尾处特别提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

借用《道德经》和《共产党宣言》中上述这两段话，结合全球化发展的实际，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方位就是：代替过去大国争霸和以强凌弱的旧时代的，将是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在那里，每个国家的自由发展是所有国家自由发展的条件。

参考文献：

- [1][2][3][4][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6，277，277，278，294.
- [6] 外媒：基辛格建议中美为竞争设界限 [N]. 参考消息，2020-10-09.
- [7] James Goldgeier and Bruce W. Jentleson,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Entitled to Lead the World[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5, 2020.
- [8] [美]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M]. 蒋葆英，等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1.

作者：虞崇胜，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周修琦